

译介之旅



布达佩斯风景

钱虹：余泽民先生，你好！虽是初次相见，但我们已有过多次微信联系。2019年我申报“欧洲华文文学及其重要作家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立项。在此之前，我就开始关注欧洲各国的华文文学之历史与现状，自然也把你作为匈牙利华文作家的文学创作与翻译在内。我搜集了你在国内出版的作品集，如《匈牙利舞曲》《狭窄的天光》《纸鱼缸》及《咖啡馆里看欧洲》《欧洲的另一色彩》等文化散文集，也买了你翻译的几本匈牙利文学作品，但并未意识到你如今竟会因翻译家的盛名而“遮蔽”你华文作家的身份，尤其是在去年10月公布了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请问，你是怎么看待你的双重身份以及你的创作的？

余泽民：钱老师好！谢谢你关注我并做了相关研究。去年10月9日瑞典文学院公布我的老朋友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荣获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作为中文翻译者的我似乎也得了个“影子奖”：国内许多媒体的采访电话蜂拥而至，那一周白天黑夜都在应付记者，几乎腾不出时间看微信。有些人连我翻译的书都没看过，写的文稿不仅谬误百出，甚至胡编乱造，我还得耗时费力去更正，帮助修改稿件。诺奖宣布后，我回到北京，看到《文艺报》刊登了你写的《在外语中安身，在母语里安心——论旅欧作家余泽民的小说创作》。非常高兴你把我的作品纳入研究视野。我的写作长期以来都被翻译所遮蔽，突然读到评论我小说的文字，觉得亲切极了！

钱虹：其实这篇文章只是我近期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结题书稿中的一小节。因为看到不少媒体只提你的翻译而不

了解你的创作，所以我想让大家知道你也是有所成就的作家。

余泽民：如果以后您还继续探讨我的创作话题，我会全力配合，让我稍稍找回自我。这些天我只谈了翻译的意义，看到你在《文艺报》上的文章，感觉是在帮我纠偏，真的非常感谢！

匈语“为我放下了欧洲文学城堡的吊桥”

钱虹：你说过1991年秋出国后，为了生存干过五花八门的职业，做过医生、果农、教师、记者、编辑、导游、插图画家、编剧、演员等等，走过一段在别人看来格外跌撞的坎坷路途。西方有句谚语：When God closes a door, he opens a window. 意即上帝在关上一扇门时，也会打开一扇窗。请谈谈你是如何顶着异国他乡的生存压力找到写作与翻译匈牙利文学的窗口的？

余泽民：1992年春天，我的生活突然陷入绝境，我在边境城市塞格德，平日连房门都不敢出。我的写作，正是从那段穷困、绝望、抑郁、孤单的日子开始的。最初只是对生存即时状态及情感轨迹的如实记录，写下了大约三百多万字的作品，但从未想过要发表。后来随着外语阅读的丰富，对欧洲文学的语言风格和写作技巧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自觉不自觉地个人写作中进行各种尝试。1993年早春，我在塞格德城的好友亚诺什家与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初识。那时我还不通匈语，只能用磕磕巴巴的英语和他交谈。他兴奋地讲了他一年前去中国的感受，告诉我李白是他最喜欢的中国诗人，还送了我一本他写的游记《乌兰巴托的囚徒》，尽管我一个词都看不懂。我则用毛笔抄了一首李白的《早发白帝城》送给他。就在当晚，他驱车把我带回两百公里外的北方家中住了一周，当时他住在皮利什山脚下的乔班考村。从那之后，我们成了常来常往的朋友。两年后，拉斯洛搬到皮利什森特拉斯拉洛村的一个小山丘上，并在那里盖了一栋东方味的木屋别墅，他一直住到现在。那栋山居后来我去过多次，我不仅为他的木屋刷过桐油，还在那里做过好几次饭，参加过好几次匈牙利文友的聚会。我与200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凯尔泰斯·伊姆莱、有“匈牙利的乔伊斯”之称的艾斯特哈兹·彼得、著名诗人马利亚什·贝拉等人的初次见面都是在那里。造化弄人，谁能想到后来我竟会成为他们的“中国声音”。1998年，我陪同拉斯洛在中国游历了一个月，登泰山、过三峡，走了十座城市。回到布达佩斯后，我对他的作品产生了好奇，于是翻着字典开始读他的短篇《茹兹的陷阱》。这是我第一次读匈语小说。在此之前，我从未系统地学习过匈语。可以说，酒馆、咖啡馆就是我的语言学校，朋友们和字典是我的老师。

钱虹：如此说来，你除了有很高的文学和语言天赋外，还有珍贵的友情。我知道匈语与欧洲绝大多数语言都不同，它和芬兰语被称为“世界语言学上的两个孤岛”。所以，匈语对于一个母语为中文的中国人而言并非轻而易举，甚至可以说是相当艰难的。请你谈谈如何攻克匈语这一“世界语言学上的孤岛”，并且翻译了数十部匈语文学名著的？

成为他们的“中国声音”

□钱虹 余泽民

余泽民：如果从难度讲，匈牙利语简直是“魔鬼的语言”。匈语的形成自然有着独特的历史。匈牙利人不习惯说主语，主语、时态和语态都体现在词尾变格上，而一个动词就会有近四十种变格，不同的词还有不同的变格方式，一个几个字母拼成的短词，加上词尾后居然有长达几十个字母！因此，即便学会一个词的原型，你在生活里也用不上，哪怕捧着字典也没用，何况当时根本没有匈汉字典。我最初的阅读是从电视报开始，一块火柴盒大小的电影简介，我得连查带问再琢磨地看个把小时！不过正是匈牙利语，为我放下了欧洲文学城堡的吊桥。我出于好奇开始借助字典读《茹兹的陷阱》，谁料这尝鲜式的阅读是一次空前的折磨，几乎每个词都要查字典，每句话都要推敲语法。读了半页，我决定把它翻译过来，这样既学了匈语，也练了中文。这篇译成中文大约八九千字的短篇小说，我足足翻译了半个月。后来才知道，自己第一次翻译就啃了块硬骨头，因为拉斯洛的文字是匈语家里最难译的。那篇小说虽不长，语言却非常复杂和稠密：一个主句带多个从句，一环套一环，中文确实很难传达。从我的译文中也不难看出他的匈语原文那种凝滞、沉重、像火山岩浆缓慢涌流的感觉。昏天黑地的半个月过后，我感觉做了一件超过自己能力的事情，感觉就像是你随便写了点什么东西，却意外地获了大奖一样。你再做这件事会上瘾的。

“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作”

钱虹：原来你翻译匈语文学经历了“好奇—(借助字典)阅读—翻译—上瘾”的历程。2002年凯尔泰斯·伊姆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几家国内出版社都想得到他的作品中文版权。几经波折，是你帮助作家出版社拿到了《英国旗》《船夫日记》等四本书的版权，并承担了中文版翻译工作。请问你翻译的时候比拉斯洛《茹兹的陷阱》要顺利些吗？

余泽民：并不顺利。凯尔泰斯·伊姆莱、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他们都喜欢用不加逗点的繁复长句。我花了近两年的时间才译完凯尔泰斯的4部作品。翻译他的作品，对我是个极大的挑战。比如《英国旗》的第一句，就是占用整页篇幅复句套复句的一个长句，为此我整整翻译了两天。在凯尔泰斯的作品里，不仅充满一页一个句号、读起来令人窒息的复杂长句，更充满了精准深邃、触感灵魂的哲思。尤其是在《船夫日记》里，作者可说是用“上帝的眼睛”客观而详细地记录了三十年间散落在日常生活中的思维碎片，近乎残酷地展现了自己大脑沟回中每个神经末梢的真实冲动。我觉得，凯尔泰斯是20世纪留下来的最后一位孤独的哲学家。随着废寝忘食的翻译过程，渐渐地我觉得自己处于发现一个未知世界的惊喜之中。凯尔泰斯那些深邃、富含哲理，抑或令人不解、读来时常感到窒息沉重的富有肌理的语言，更让我有一种冥思苦想后释然的解脱和兴奋。作品中那种震撼人心的生命力，让我有了一种脱胎换骨般的彻悟。

钱虹：太不容易了。你是将自己的心贴近文学，用如同朝圣般的虔诚和心血来翻译凯尔泰斯、拉斯洛等人的作品，而非像当下有些译者只是把翻译作为不同语种之间的搬运工，译出的东西不是淡而无味，就是屈臣整牙，让人难以平

读。你的译文不仅文字精准，而且淋漓酣畅。我一直在想你为什么能把匈语那些文学名著翻译得那么出色？除了精通外语以外，母语水平的精湛，尤其重要。我很佩服你的中文语言功力。请谈谈你翻译时如何针对不同作家的语言风格加以处理？

余泽民：我觉得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作，不仅要求意思准确、语言流畅，还要尽量不失真地传达作者原始节奏和情感力度，好的译者应该都兼顾到。其实，原封不动直译原文的译文，不见得是好译文。比如，凯尔泰斯《命运无常》结尾的一段话，我是在斟酌了每个词、朗读了无数遍之后才最后定稿的。我很赞同你在论文里所说：“从某种意义上讲，翻译凯尔泰斯的作品真正开启了余泽民的文学生涯，并让余泽民的文学感受有了质的飞跃。”确实如此。后来翻译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的《撒旦探戈》，于我更是受难般的虐读。整部小说从头到尾都是黏稠、缠绕、似火山熔浆涌流，而且不分段落，让人读得喘不过气。即便是匈牙利读者，读拉斯洛的作品也是一种阅读挑战。他的句式既很难读又很耐读，细腻又粗粝，细碎又宏大，构造精密，富于律动。如果翻译不好，会让人读起来觉得上气不接下气。因此，不难理解为何连续两届美国最佳翻译图书奖都颁给了拉斯洛作品的英文译者和译者：2014年是《撒旦探戈》，2015年是《西王母下凡》，评委们认为两位英文译者“发明了一种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式的英语”。

钱虹：所以你要在译文中既保留拉斯洛重叠、缠绕的迷宫般密不透风的句式，又让中国读者读到“一种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式的中文”。《撒旦探戈》开篇“十月末的一个清晨”那段文字不分行、不分段落，长达27页，对译者的中文表述更是严峻的考验，没有你那之前十几年里三百多万字的中文写作的语言文字积累是根本做不到的。

余泽民：翻译完这本小说，我感觉从人间到地狱走了一遭。所以，我坚信，好译者必须是自己也写作的诗人，评家欧阳江河有个采访说得很好。

钱虹：欧阳江河的那篇采访我拜读过，特别有感触的是：“普通作家用的是现成语言、二手语言，用的是所谓的‘母语’，他们没有深入到文学的‘原文’去写作，没有用文学的‘外文’来写他们的母语。”确实，当下不少人是用“现成语言、二手语言”来写作、翻译的。所以，我认为仅仅懂外文是成不了一流的翻译家。我年少时迷恋傅雷翻译的法国作品，如《高老头》《贝姨》等，觉得他的翻译很神奇，明明是外国小说，却不觉得拗口。翻译家首先应该是母语写作很棒的人才！

余泽民：对对对，太高兴你这么说了，有知音的感觉。翻译家应该首先是对文学语言敏感、有创造力的作家。欧阳江河兄的提炼非常到位。“二手语言”，虽然尖锐但十分准确。

钱虹：这不仅是创作和翻译的工具、技术问题，更是语言创造力和文字生命力的试金石，文学翻译绝不是简单的语种“转换器”。当然，这也需要对原著怀着敬畏之心，百分百地投入时间、精力、耐性和恒心的一种文学修炼和精神洗礼。要静心并且耐得住寂寞孤独才行。

(钱虹系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秘书长、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余泽民系匈牙利语文学翻译家)



布达佩斯风景

鲁迅读过卡夫卡吗？

□曾艳兵

2025年年底我在《文艺争鸣》(第12期)上发表了一篇久经思考和沉淀的文章《鲁迅为什么没有读过卡夫卡?》，文章主要论述了鲁迅没有读过卡夫卡的原因。“尽管我们知道鲁迅关注外国文学，尤其关注域外弱小民族的文学，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材料证明鲁迅知道卡夫卡，阅读过卡夫卡的作品。查询《鲁迅全集》，我们找不到卡夫卡的名字……卡夫卡的遗著在卡夫卡去世后经由布罗德整理陆续出版，他的三部长篇小说《诉讼》出版于1925年，《城堡》出版于1926年，《美国》出版于1927年，但却并没有被鲁迅所关注和记录。这对于研究鲁迅与卡夫卡的学者而言还是有些遗憾的。”

现在终于找到一点材料，证明鲁迅没有读过卡夫卡，或者说不知道卡夫卡。1937年12月，由捷克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Jaroslav Prusék)与弗拉斯塔·诺沃特纳(V. Novotná)合译的鲁迅的《呐喊》由布拉格“人民文化”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时附有鲁迅亲自撰写的序言《〈呐喊〉捷克译本序言》。该序写于1936年7月21日，鲁迅在序言中写道：

记得世界大战之后，许多新兴的国家出现的时候，我们曾经非常高兴过，因为我们也是曾被压迫、挣扎出来的人民。捷克的兴起，自然为我们所大喜欢；但是奇怪，我们又很疏远，例如我，就没有见过一个捷克人，看见过一本捷克

书，前几年到了上海，才在店铺里目睹了捷克的玻璃器。

我们彼此似乎都不很互相记得……自然，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可惜走这条道路的人又少得很……

我想，我们两国，虽然民族不同，地域相隔，交通又很少，但是可以互相了解，接近的，因为我们都曾经走过苦难的道路，现在还在走——一面寻求着光明。

捷克兴起时鲁迅有大欢喜，鲁迅是关注捷克独立的。捷克原本属于奥匈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匈帝国灭亡了。1918年10月捷克和斯洛伐克宣告独立，联合成立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鲁迅欢喜于捷克的独立，但也“奇怪与捷克的疏远”，乃至至于直至写序的时刻，还“没有见过一个捷克人，看见过一本捷克书”。两天之后，1936年7月23日，鲁迅在给普实克的回信中写道：

对于捷克，我却有一种希望，就是：当作报酬，给我几幅捷克古今文学家的画像的复制品，或者版画(Graphik)，因为这介绍到中国的时候，可以同时知道两个人：文学家和艺术家。倘若这种画片难得，就给我一本捷克的有名的文学作品，要插画很多的本子，我可以作为纪念。我至今为止，还没有见过捷克的画。

鲁迅非常想了解捷克文学和美术的情况，他甚至可以放弃翻译版权的报酬，只需要几幅捷克古今文学家的画像或一部捷克的有名的文学作品。他一再强调，“还没有见过捷克文的书”。弗朗兹·卡夫卡(1883—1924)从1918年以后就属于捷克人，他写的书自然也属于捷克书，虽然并非用捷克语写成。他的书曾经被女友密伦娜翻译成捷克文，他当然也算是捷克作家。看来鲁迅的确不知道卡夫卡，没有读过卡夫卡的书。

普实克为捷克斯洛伐克著名汉学家，布拉格汉学派奠基人。1928年他毕业于布拉格查理大学，这正是卡夫卡毕业的学校。但这时的大学与卡夫卡读书时的大学相比早已面目全非了，德语和德国人在这里几乎完全没有了位置。这时候的捷克人是不愿读德国人的书的，尤其不喜欢读布拉格人用德语写的书，何况卡夫卡还是一个犹太人。读卡夫卡的书几乎成为一种禁忌。1932年普实克受东方研究所派遣来华考察两年半，重点研究中国社会和文艺。由此有一种推断，可能普实克也不知道卡夫卡，没有读过卡夫卡；也许他知道卡夫卡，但却认为卡夫卡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作家，所以他没有将卡夫卡当作一位杰出的捷克作家介绍给鲁迅。

卡夫卡生前默默无闻，不过是保险公司的一名普通职员，再说他用德语写作，还是一个犹太

人，当时的捷克人自然不会关注他。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捷克从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下独立出来，而此时捷克的民族主义极度高涨，已经到了淹没一切的程度。卡夫卡，作为一个用德语写作的犹太人，将布拉格又描绘成一个如此黑暗、不祥的城市，他在捷克不受欢迎就可想而知了。在他死后的十年内，捷克没有出版过他的一本书，连捷克语的译本也非常稀少。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德国纳粹的上台，卡夫卡及其作品在捷克的命运更加坎坷。1939年，德国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布罗德没有收集到的卡夫卡的作品全部被德国人销毁了。1963年在布拉格比利城堡召开了一场关于卡夫卡的著名讨论会，卡夫卡在布拉格渐渐受到关注和重视。“此前，从官方角度来说，在捷克斯洛伐克是没有卡夫卡这么个人的。捷克当局一直在禁销他的书籍，而且声明无论是那些书还是它们的作者都不曾存在过……追想着卡夫卡在他的祖国竟然被人活生生地抹掉那么多年……真是太具有卡夫卡的风格了。”长期以来，在捷克版的《历史名人录》中，没有卡夫卡的名字。卡夫卡在他的家乡从来就没有归属感。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成长并接受教育的普实克，怎么可能阅读卡夫卡，介绍卡夫卡，赞扬卡夫卡呢？因此，在普实克那里，鲁迅失去了一次了解卡夫卡的绝



鲁迅与卡夫卡漫画形象

好机会。三个月后，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鲁迅不可能再有机会听说卡夫卡，阅读卡夫卡了。

(作者系山东大学卡夫卡与中外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图片来源于网络，请作者看到后与本报编辑部联系)